

## 《嘉兴藏》整理记

杨玉良 邢顺岭

《嘉兴藏》因其发行于浙江嘉兴楞严寺而得名，又因其版片存储和刷印于浙江余杭县径山寂照庵，亦称《径山藏》。它在我国现存历代大藏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以其鲜明的特点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目前，北京、云南、浙江等地存有九部，台湾还有一部。但大都正续不齐，卷帙残缺不一。关于此藏刊刻的基本情况，曾有不少人做过调查考证，但限于条件，研究的结果不同，在一些书史、版本学等书籍和专题论文中，也是众说纷纭。如，刊刻的起讫年代，一般都认为始自“明万历十七年”。完成时间，有的说是“康熙十六年前后”，有的说“康熙十六年完成正藏、续藏，又续藏何时完成待考”。在函数、种数、卷数上，有的说“正藏”共二百一十函，一千六百五十四种六千九百五十六卷，按千字文编号，始“天”终“碣”，“续藏”、“又续藏”计九十函，二百五十六种一千零四卷；还有的说“正藏”共二百一十一函，“续藏”九十函二百四十八种约三千八百卷，“又续藏”计四十三函三百一十八种约一千八百卷。有的则说“正藏”六百七十八函，一千六百五十四部六千九百五十六卷，函号始“天”终“鱼”，“续藏”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续藏”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至于刊刻的主持人、刻藏地点、资金来源等问

题，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的问题尚未涉及。因此，对它很有深入调查了解的必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部《嘉兴藏》，卷帙比较完整，笔者有幸参加了该藏的整理工作，编出子目，并针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些探索，发现了很多实际依据，解决了一些疑惑问题。现分述如下：

### 一、故宫藏《嘉兴藏》的函、卷、版式、行款和装帧

故宫收藏的《嘉兴藏》，除个别函的首末册朽烂残缺外，绝大部分完好如新。全藏系明万历七年至清康熙四十六年刻、顺治十七至雍正元年递修本（个别页有雍正、乾隆年间抄补）。共计三百四十四函，另有首函。二千一百三十七种一万零八百一十四卷。其中“正藏”：首函为刻藏缘起、三藏圣教目录、画一共计六卷。此外，计二百一十一函、一千六百六十五种七千八百二十九卷，千字文编号，始“天”终“史”，自第二百零六至二百一十一函，为北藏缺附南藏函号。“续藏”九十函，二百五十二种一千八百二十卷。“又续藏”四十三函，二百七十七种一千一百五十九卷。

全部藏经用纸大多为白棉纸，亦间有粉连洒纸。纸质坚韧细腻、富有绵性，色泽洁白如玉。文字书写风格各有不同，明万历初年多为拳刀笔法，笔锋生动，富有楷书帖意；明万历末年趋于横轻竖重的宋体字，即所谓“板字”，崇祯年虞山华严阁刻本，字体大多扁宽，行格疏朗，写刻精良，代表了毛晋刻书的风格；清顺治康熙年间刻本，字体较前期略小并趋向瘦长、呆板。全部藏经刷印精致，墨色漆黑，看去悦目醒神。每函首册首页大都附有绘刻的释迦牟尼像或少量的高僧像、赞。板框、行款不尽相同，一般为四周双边，栏线外粗里细，白口，半页十行二十字。但早期刊刻者亦有四周单边、或左右双边，线黑口、单鱼尾、七行十七字、八行十七字、九行十九字、十行十九字或十一行二十字不等。还有无边栏、行格的手写体。板框高23公分、宽15.4公分或高24.5公分、宽16.4公分不等。书口上镌“支那撰述”或“经”、

“律”、“论”字样，亦间有刻语录、杂著之书名或墨钉者。书口下镌有千字文编号字序或重修人姓名、年代或墨钉。也有个别撰著的版心上刻“高木堂”、下镌刻工名者。全部藏经装帧均为方册线装，黄花绫书衣、黄绫包角、黄丝线装订，褐黄绫书签，书题大多为刻印宋体字，亦有少量墨书宋体字者。彩色织锦函套。具有雍乾时期内府装帧的鲜明特色。

据此藏之首函“重刻北藏目录”载浙江巡抚都御使李馥雍正元年《补刻嘉兴楞严寺藏经序》云：前明紫柏大师重视佛典，因贝叶梵笈难于流传，便改刻方册本贮之楞严寺中，“历今百有余年，板多漫漶兼有亡失，癸卯岁来抚兹土，余虽儒行不习佛法，然仰惟世运承缙素安堵（堵），恭届圣天子御极初元，……，捐资补刻，使完旧观。”另，该目录中附有清宫内府书写的两个内容完全相同的黄纸条，上面写着“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总管王常贵传问後佛楼供奉藏经内有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请旨撤去。今查得书本藏内有《楞严蒙钞》二套（按二函）计十四本，于二十六日首领白玉凤送进呈览，胡世杰传旨：着交内养心殿佛堂收”。经查对，该藏经确无此种，并于此目录“续藏”之第二十九至三十函《楞严蒙钞》项下，贴白浮签注“奉旨撤出”。于“正藏”第一百九十六函一千六百二十八号“肇论新疏”内夹一黄纸签注曰：“查得经本藏内肇论本文竟未入藏，有肇论新疏十卷、肇论新疏游刃十卷、晋僧肇法师宝藏记一卷”。据纸质、字体之特征，仍系乾隆年内府之校注。上述说明这部大藏经当在雍正初年至乾隆三十四年间进宫。并经内府加工装帧。至于何人进呈还是奉旨重印，尚待考查。

## 二、《嘉兴藏》刊刻的大概经过

据明颢愚观衡和尚撰《刻方册藏经目录序》称：万历初年，紫柏大师因见南北二藏难于流布，乃与二三子确议无疑，立意劝

善士耘越捐身命之财，饬坚固之板，易梵筭为方册。“此一大事始兴于神庙八九年间”。查故宫藏《嘉兴藏》内刊刻最早的时间为“万历七年”，即“续藏”第四十四函内“寒山子诗集”，前有万历己卯王宗沐序。第三十一函内“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会译”四卷，为万历八年冯梦禎捐资刻成，前有万历八年冯氏刻经序。由此可印证紫柏等和尚发愿刻藏的时间和《嘉兴藏》开雕的最早时间基本一致。但刻经事项因措施不力，进展极为迟缓，自万历七年至十三年间，所刻数量很少。查故宫藏《嘉兴藏》内，仅万历七、八、十二、十三年间的四年间，只冯梦禎、紫柏等捐刻了六种，万历十四至十六年间无刻。所以密藏道开禅师在《刻大藏愿文》中自称：万历十年赴武林，在绍兴途中因见古寺残碑有感，立誓“愿毕此生身募刻方册板，广作流通”，遂至嘉兴寻紫柏兼晤冯开之（冯梦禎）等人议决，得知他们“已先发是愿，即共订盟从事，然遑遑三载莫得其诸（绪）。密藏道开才又于万历十四年去长安，与傅光垞诸居士“反复思究”，深知“善建事者必先植本”的重要，便决定“以善信十人，岁各捐资”，先行刊刻，并于同年发“募刻大藏文”，决心“负笈九州乞金”刻藏。此举博得陆光祖等人的赞誉和支持。在于元凯撰《密藏禅师遗稿序》中称：“万历丙戌（十四年），师弟同入京师，慈圣皇太后（万历皇帝生母）知有刻藏之举，欲发帑金命刻。尊者（紫柏大师）谓：宜令率土沾恩，师愿以一身任事，遂撰文广募，随立条规”。经过紫柏真可、密藏道开、幻予法本等人的积极筹措，于万历十七年“奉慈圣太后旨”再行开雕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这与故宫藏《嘉兴藏》的实际情况又是相符的。

刻藏在五台虽已就绪，但刻藏地点又准备迁于江南，主要原因有三：一因“五台冰雪积岁，恐侵及板”，而径山位在江南，极为温暖，“山不为峻易于上下，剗斲供给事事得便”，二因“北地缘簿而费倍”，“江南善信颇发背心，而北地则罕有应之者”，筹集资

金困难；三因北方政局动乱，农民起义四起，而“秦晋燕赵尤为近辅”。所以，于五台刻就数百卷后，于万历二十至二十一年间，连同已刻未刻之板一并自“临清登舟”迁至径山。查故宫藏《嘉兴藏》，自万历二十年以后，再无“五台妙德庵”刊刻的牌记，亦可为证。

颢愚观衡和尚在其《刻方册藏目录序》中还称：万历三十一年紫柏、憨山二禅师先后遭难示寂，此后“四方刻资归聚亦微，因就施者之方，任力刻之，于是四方有道力者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自癸卯岁至壬午岁（万历三十一至崇祯十五年）将四十年，梓未虚日，其事犹未竟。已刻者不及归山，未刻者懈不速完”。这说明了此间刻藏趋于缓慢。自崇祯十五至清顺治初年，有贵州赤水继庆利根和尚等人尽力“编讨径山、嘉兴、吴江、金坛诸处已刻成者”，记录在目，又赴云间商之，徐、李、黄诸大衲越欣然就事。“已刻者十之八九，未刻者十之一二耳，不期半载可完”。同时上疏请旨，催四方已刻之板同归径山，再请御制序冠方册之首。据故宫藏《嘉兴藏》的实际情况，崇祯十五至十六年间，刻藏还得到了泰和萧士瑀、萧士玮、杨仁愿，常熟毛晋父子、郭承昊、杨彝等人的资助。崇祯十七年以后，“正藏”并未刻完，自崇祯末年至顺治初年，又有冯洪业诸人的施资募刻、嘉兴楞严寺庚子年余资及僧众们的耘越续刻，直至康熙十五年才完成了“正藏”的全部和“续藏”、“又续藏”的部分刊刻。康熙三十八年全部完成“续藏”和部分“又续藏”的刊刻。康熙四十六年全部完成“又续藏”的刊刻。据故宫藏《嘉兴藏》的实际情况，在顺康时期，积极主持刻藏的有彻微印开、巨彻寂暹以及解印、灵耀、灵慧、恒瑞、契颖、契禅等人。刊刻最晚的年代有康熙四十六年刻语录三种：善一纯禅师语录三卷续录一卷，其牌记为“信女危门王氏……同刻，海盐陈子兰书，楞严夏维宁，倪尔绳同镌，康熙丁亥季夏穀旦，嘉兴楞严寺般若堂藏板”。其他两种语录的牌记同上。

这项原预计“十年竟事”的出版事业，却经历了一百二十九年，其间，约有六代僧众信士们的相承努力。《曹溪憨祖大师自著年谱》于万历三十一年之末，附有其法嗣福徵的按语，称紫柏倡缘刻藏时，陆光祖与冯梦楨、曾同亨、瞿汝稷鸠工于径山寂照，密藏道开、幻予法本、澹然铠公“迭董其事。”后桐城吴用先复化城为贮板之所，师既刻藏嘉禾。天启三年，江西宗派白法老人性琮住持楞严，刻藏稍有就绪，而化城僧清隐捏造变乱之说，白公不避嫌怨终不动摇，直至顺治二年兵变大乱，白公仍坐镇经坊。紫柏五世法嗣解印，于顺治己亥（十六年）书《密藏禅师遗稿后跋》中称：紫柏有徒七人，担负刻大藏者，惟“密祖与幻予祖也。恢复化城中兴刻藏者，乃澹祖也，幻居、寒灰二祖者赞襄刻者也”。密祖之徒念云翁，其“续祖父之志，续刻未刻之经，司掌经坊，吴江开建禅林接待往来云水，二时茶饭精严，天下禅流称颂”。念翁之徒香庵也，其具慈忍心，体佛祖意，持莲华经数千余部，寒暑不歇，老病坚持。香叔之徒，明一早逝。明一之徒契颖，其“傑出缁伦，注心道法，慨祖宗之公案未完，收辑密祖遗言广布，担愿了完全藏”。查故宫藏《嘉兴藏》之牌记，化城中兴时期是在万历四十年以后；而吴江开建禅林，是在天启年以后；继庆利根和尚主持续刻当在崇禎十五年以后；而性琮、印开寂暹、解印、契颖、灵耀、灵慧、恒瑞诸人主持刻藏，正值顺康时期。他们是完成《嘉兴藏》刊刻的中坚力量。

颺愚观衡和尚撰《刻方册藏经目录序》中还讲：紫柏老人经营刻藏三十年，未能目睹竟事，其未完之业有八：“四方之板未归径山一也，未完未制方册藏首序二也，贮板之方构造未广三也，因板未完板头钱未总则定数四也，板头钱预修贮板之室未得良策多有昌用五也，目录依五时之次，其正译重译华梵传述未尽其详六也，搜括古今名集遗漏未全七也，因板未完劝者施者鸠工者未勒名于石以昭千古八也”。这八件事除最后一项未见实施外，其余

七项均由紫柏老人的后代嗣法子孙相继续努力，历经一百多年，终于完成了刻藏大业。可见以紫柏、密藏为首的六代禅僧在主持刻藏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密藏禅师为例，初创时期，他住持山中，在挑选写刻匠人、校对刊刻、采办梨板、索要施资等情事上，做了大量工作。《密藏禅师遗稿》中，收录了万历十八至二十年间，他与诸居士缘首们的书札，大都谈及刻藏事直，现择录几段以供了解：

与张梅村居士书：“己丑年（万历十七年）刻藏椽施具已到第，以刻工来迟，未尽登木。兹将刻过姓名先呈览阅，其未完者陆续完报。盖筮创之初，事难卒备，而县生师南发又未可迟迟，故有是事，继此以往，自当岁完一岁，或可不至如是堆塌耳”。

与冯开之（梦禎）居士书：“刻藏因缘虽已就绪，然期场南北未卜终始。此方撰述校仇端属名贤，幸无忘念。新刻楚石语录诸典各一部，远充法供。幻居兄挂锡径山否？获持之责，舍足下其谁？并乞留意”。（按：楚石语录为万历十八年陆光祖施刻）。

与吴江周仲大等三居士书：“南来之众，皆已入堂校对华严合论，写刻者亦相继从事矣。江城所刻八卷，近入校对其讹舛，视东禅本尤甚，山中新刻幸得多本校仇，过或差少。然校书如扫叶，自古难之，第写刻颇工致，不下弘明诸书。大藏终始如斯，诚至愿也。”（按：华严合论为万历十九年傅光垞施刻）。

与吴康虞居士书：“刻工始末，……。徽人勤俭，雅称山居信有，如足下所云。舍徽人则江西、福建亦庶几其，近之，吴人信未可独任。第此时写刻所尚皆弘明集家法，非吴人，则虽各有所长，而独短于此，矧拳刀笔法尤于板字不宜。近有歙工吴应芝者来山，以言乎帖意款字，无或居其右，独此，则视众工隘乎其后。远途跋涉，进退为难，良自苦矣。黄守言者，其手笔绝伦，固于墨谱见之，第恐其于板字，亦非素习。山间此时选择颇精，不亚弘明。”“北方定价，字每百工食银四分，彼辈诚能改拳刀刻板字，

固所愿耳。南羽所绘经首佛像，须觅此人镂刻乃善，刻已可寄楞严，属首座”。（按：南羽，即丁云鹏，万历年画家）

与朱济川乐子晋二居士书：“妙德在清凉最幽深处，清凉为震旦大菩提场，刻藏因缘卜吉于兹。信非人力南北云集，僧伽百余，……场内身心踴跃，气夺三军，或架槽榼烧品字则本光盎然，或持籤轴剔蠹鱼则义天廓尔。兼之二三知己，东语西语，提唱无生，琼树琪葩、万壑千林，宣扬玄妙”。

与曹林忠庵师兄书：“弟居妙德，可谓深心极力调持，然上下百余人，求其能以心相照者尠矣”。“不肖居山，丛林上下，百责萃身，自朝至暮，略无暇刻，兼之经典款则，一一经心；工匠胡乱，一一调制”。

通过以上书札，可以了解到初创刻藏的大概，更说明了密藏禅师在此间总理各项刻藏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 三、《嘉兴藏》刊刻的资金来源

如此巨大的刊刻事业，没有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充分保证和有效的组织措施，是难以实现的。初创时期，资金来源更是核心问题。为此，密藏禅师做了巨大努力。最初，他于万历十四年去长安与傅光坨等人议定“以善士十人，岁各捐资”先行刊刻，但因施资大都北方差胜，实难坚持，便又提出“岁集耘越四十分，分百金，期十年终事”的主张，他与顾襟宇少叅书札中亦称：“同瞿元立辈商确刻藏缘事，始定长缘四十分，分岁百金，自一人以至多人，惟信心坚久者许与之”。在其与徐文卿居士书札中亦云：“计得四十人为缘首，每人岁助百金，与刻工相始终。燕、赵、齐、鲁大约有二十人，江南如金坛之于（玉立）、丹阳之贺（学易）。吴江、松江诸处拟求十人，外十人则求之徽州、蒲州二处。……松江必以足下与康孟脩为缘首，聚资即自今年始，……吴江必以周仲大为缘首，而沈及庵、顾元玉、周季华则左右之”。然而，

实际执行情况并非顺利，只能“岁得二千金，山间写刻人凡五十辈，支费耘力未充，诚为促迫”，因此，他再次计议：南北各求四十分为缘首，每人或自力或藉他力，岁出百金，每岁可得四千金，以便岁有退失，即岁免增补，常令不减此数，保证十年竟事。这些缘首们除自己积极捐资助刻外，还动员各界广大佛教信徒施资刻经，各宗禅僧也四处化缘募得资金，从而为初创时期刻藏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也为该藏最终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为保证刻藏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于万历十二年先后制定了《嘉兴藏》的“检经会约”，规定了验收校对经卷的日期和办法；制定了“刻藏凡例”，明确了该藏以北藏为底本，参与南藏及其他三藏校对、分类体系、及有关事宜；还制定了“刻藏规则”，明确板片规格、价钱及写刻工匠的工食银、奖惩办法等。使得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有章可循，做到有计划有秩序的工作，保证刻印精良。

#### 四、《嘉兴藏》牌记中的重要内容

故宫收藏的这部大藏经，绝大部分保留着原刻牌记和重修补板的记载。牌记内容详尽，不仅有募资、施资人的姓名、刻藏原因、所刻经名、卷数、字数、板片及所需银两，还有校对人、写刻工匠的姓名、籍贯、刻书年代和地点。从而为全面了解该藏刊刻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也是研究古籍板本、雕板印刷史的重要依据。现择要介绍于后：

1. 牌记中反映的耘越资助的人数之多、成份之杂，是民间私刻大藏的特点之一。捐资人中有各地禅师及其弟子、儒林志士、各级官吏、藩王贵族、宫内太监，亦有地方的豪绅、农民、市民和参加写刻该藏的工匠等。其中有社会名流，亦有普通百姓，有的是全家老少施刻一部或几部经者，亦有一家几代相承连续刻藏。特别是有相当一批在当时政治界、文化界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参加，成

为刻藏事业的骨干。如：刑部郎中于玉立、翰林院检讨王肯堂、山西巡抚监察御使傅光垞、工部右侍郎吏部尚书陆光祖、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禛、太仆少卿瞿汝稷、四川巡抚王象乾、福建福安县知事贺学易、兵部主事袁黄、广东巡抚叶绍颿、武英殿中书舍人顾正谊、贵州提学副使包恂芳、两广都察院熊文灿及陈继儒、钱谦益、毛晋父子等等。他们不但积极捐资刻藏，还联络发动其所在地区的地主乡绅、中小官吏及广大群众施资，有的还亲自参加校仇、撰述、写序，使得此藏的刊刻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有着可靠的经济来源；也使得这部大藏的内容、刷印质量均较南北二藏更为精良和丰富。正如密藏禅师所说：“逐年捐资既苦，而积以十年，则功勋且多矣。”的确，他们在刊刻此藏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建“功勋”实在大矣！

2. 通过牌记可以了解参加写刻工匠们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大都来自南方的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五个省的五十多个县区。有署姓名的刻工达387人，书工84人，绘刻3人，连同署姓无名的写刻工匠，其总数仅次于宋刻《磻砂藏》的写、刻、绘工匠的总数。而且有不少工匠担任该藏的写刻时间长达十几年、几十年之久。如长洲书工徐普，自万历十八年至天启六年的三十七年中，一直为《嘉兴藏》写板。目前已知他从事写书板的最早时间为万历二年，由此算起，他以此为业达五十六年之久，并以其大半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嘉兴藏》。也有不少工匠大都属于一个地区、一个姓或一个家族的几代。如上元陶姓刻工有24人之多，陶邦立（刻板时间为万历十九至天启六年），陶邦本（写刻时间为万历二十七至四十五年）。句容潘姓刻工计13人，其中潘沔（刻板时间为万历十九至天启六年），潘继德（刻板时间为万历三十六至四十七年），潘继立（刻板时间为万历三十一至天启六年），潘以铨（刻板时间为崇祯十五至十七年）。还有的是父子同刻一部经者，如“又续藏”的一个牌记中有“嘉郡陈馥林子美璋同

梓”字样。这些记载不仅是写刻工匠们为传播佛教文化典籍、发展雕板印刷事业，付出辛勤劳动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其他有关学科发展史的宝贵材料。

3. 不少牌记中还记载了相当数量的刻藏银两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六百八十多种四百多卷一千多万字的写刻银两总数达一万六千一百十八两四钱九分六厘七毫。如：“正藏”第一百十三函“大乘楞伽经唯识论”的牌记：“泰和萧士瑀捐资刻此一卷，殷时衡、毛晋同对，崇祯甲申孟春虞山华严阁识。”“论一卷，共字九千六百十五个，写银三钱八分五厘，计刻银三两三钱六分五厘，共板十三块，计工价银六钱五分。常熟刘秉愈书，句容潘以铉刻”。“正藏”第四十六函“佛说不空罽索咒经”，为清顺治十二年平湖朱家椽刻，其牌记内称此经“共字五千二百六十四个，写刻银三两七钱九分，板七块五钱六分，笫头纸煤八分”。由此可知崇祯十七年的写工价每百字约四厘，刻工银每百字约三厘六毫，梨板每块价五分。顺治十二年时，写刻工价银每百字约七分，梨板价每块八分。这些为了解明万历初年至清初各个时期写刻工匠的工资水平、梨板价格及江南一带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史料。

4. 由于牌记的真实记录，还得以具体了解这部大藏经刊刻的地点及其雕板时间。现依其刻藏起讫年代的顺序，择录于下：

五台山（清凉山）妙德庵	万历十七至二十年
五台山（清凉山）妙喜庵	万历十七至二十年
径山寂照庵	万历二十一至崇祯四年
径山兴圣万寿寺	万历二十一至天启七年
径山寺	万历二十一至二十五年
休宁大寺华严堂	万历三十七年
金沙东禅青莲社	万历四十至天启七年
径山化城寺	万历四十至天启七年
金沙顾龙山	天启年

吴江接待寺	天启四年至崇祯年
吴郡寒山化城庵	崇祯年
金坛紫柏庵	崇祯年
径山化城院	崇祯四年至顺治十二年
松江抱香庵弘法会	崇祯十六年
虞山华严阁	崇祯十五至十七年
径山古梅庵	顺治年
德藏寺藏经阁	顺治十三年
嘉兴楞严寺般若堂	崇祯末年至清康熙四十六年

上述刻藏地点及其刻藏起讫年代,印证了文字记载的准确性。万历十三年以前刻本的牌记上虽未署刻板地点,但据《曹溪憨祖大师自著年谱》万历三十一年末有其法嗣福徵按语称:“紫柏倡缘时,陆太宰与冯司成梦禎、曾廷尉同亨、瞿同卿汝稷鸠工于径山寂照”。这说明了自万历七至十三年间刻藏地点是径山寂照庵,万历十四年密藏再次筹措时,刻场奉旨暂定于五台,万历二十一年又迁至径山。此后,写刻经板地点便以径山寂照庵、兴圣万寿寺为中心,分布于江南各地。天启以后,刻藏地点趋于分散,顺康时期又集中于嘉兴楞严寺。

5. 由于牌记详细记录了各种典籍的具体刻板年代,使我们得以准确地知道这部大藏经雕板的起讫年为明万历七至十三年、万历十七至清康熙四十六年。即“正藏”刊刻于明万历十八至清康熙十五年,“续藏”刊刻于明万历七至十三年、万历十七至清康熙三十八年,“又续藏”刊刻于明万历十九至清康熙四十六年。由此可见,最初开雕先始自“续藏”,万历十九年以后,正、续、又续三部分同时进行雕板。从而进一步印证了观衡和尚撰《刻方册藏经目录序》中所说:此刻藏大事“始兴于神庙八九年间”的说法比较接近于《嘉兴藏》的实际情况。所以目前诸家说此藏刊刻时间始自“万历十七年”,完成于“康熙十六年”是很不确切的。

实物文字证据应该使我们的认识大大提高。这部大藏经从开雕到完成，历经一百二十九年，刊刻时间之长、续刻内容之多，可为现存历代大藏经之首。

其次，这部大藏经凡属修板、补板页，均于版心下镌重刻时间和主持重修人的姓名，从而可以了解它的全部递修状况。据载，其递修的起讫年为清顺治十七至雍正元年，亦即：“正藏”递修于清顺治十七、十八、康熙元、三、六、八至十、十六至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三十一、三十九、四十一至四十七、五十七、六十一、雍正元年；“续藏”递修于康熙四、八、九、十九至二十一、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七年间；“又续藏”递修于康熙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三年。全藏递修时间历经六十四年之久。主持重修者，据载，有恒瑞约在康熙十、十六、十八至六十一年间，契禅、契颖约于康熙九、十九、二十、三十九、四十四年间，灵耀、灵慧约在康熙元、三十九、四十至四十七年间，浙江巡抚李馥主持重修为雍正元年。这些主持重修者对保持《嘉兴藏》的完整，重印流通起着重要作用，劳绩卓著。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确切地判断故宫所藏《嘉兴藏》的刻板年代为明万历七至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清顺治十七至雍正元年递修本。其雕板和重修时间之长，在我国雕板印刷史上实属罕见。

### 五、有关《嘉兴藏》目录的情况

《嘉兴藏》目录，目前仅见的有四种：故宫藏《嘉兴藏》之首函内有两种：一为明万历二十九年刻《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此目实以永乐北藏为底本进行重刻的，但在卷数上较原来目录多有增减，据统计有37种共增216卷，23种减少111卷，实增105卷。此外，万历年目录末页于千字文编号“史”字后为雍乾时期内府抄配，即北藏缺南藏号附，“合”至“塞”字五种：续传灯录、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佛祖统纪、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此目无“续藏”、“又续藏”目录。首函内另一种目录为顺治年重刻

《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此目“正藏”部分较万历年刻本有以下几点改动：① 第73函新增二十种，均为万历三十七、四十三、崇祯十五、十六年刻本。② 千字文编号“史”字后增加“鱼”字，即第206函四种：天隐、密云、大竞普济能仁、报恩美发四位禅师语录。③ 末页“鱼”字后也为雍乾年间内府抄配，即北藏缺南藏号，附“合”至“扶”字四种：行愿品别行疏钞、华严经决疑论、华严经十明论、华严吞海集。④ 增一首函，即刻经缘起、大明三藏圣教目录和画一。⑤ 增加了“续藏”目录1至95函，“又续藏”目录1至47函。⑥ 万历本目录于某经后记有“十二卷今作六卷”或“二卷今作三卷”的字样，顺治年重刻本目录则直录“六卷”或“三卷”；且万历本目录定每十卷一函，而顺治年重刻目录则打破此制；同时某些经名亦有缩略。万历本目录后计“通共677函6771卷”，顺治年重刻本目录无此。

第三种是清乾隆年内府抄本“续藏”、“又续藏”目录，此目录与顺治年重刻目录之“续藏”目相较，绝大部分相同。“续藏”自第78函以后亦有更动，如顺治年重刻目录第78函为羯磨会释（原注“印造在先后造此藏无入”），而抄本目录之第78函则改为上茨、鸳鸯、博山、雪关、尔瞻五大禅师语录。顺治年目录之第79至88函，实为乾隆年抄本目录的第78至87函的目录。顺治年目录之第89函签注“印造在先后造此藏八十九函无入”。顺治目录之第九十函实为乾隆抄本目录之第88函，此函内尚增性空、何一二禅师语录。顺治目录之第91至92函，实为乾隆抄本目录的第89至90函。“又续藏”，顺治年目录之第12函山峰宪禅师语录，乾隆年抄本目录内无有；顺治年目录之第26函有默飞密禅师语录，于乾隆年抄本目录内则改为斌雅禅师语录。且乾隆抄本目录之“续藏”止于第九十函，“又续藏”止于第四十三函。

第四种是民国九年北京刻经处刻《嘉兴藏目录》，此目前有顺治年《经值画一》、康熙十六年《楞严经坊重订画一缘起》，千字文

序，始“天”终“鱼”，目录内避玄、弘帝讳，说明此目是依乾嘉时刻本重刻的。它与顺治年目录相较，“正藏”第205函，民国年目录内有“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二卷，而顺治年目录内则无，故宫藏《嘉兴藏》内亦无。民国年目录内“鱼”字号内仅“密云禅师语录”一种，其后为北藏缺南藏函号附“合”至“碣”字，无“塞”字，亦无第211函。“续藏”之第37、41、42、51、55函，“又续藏”之第5、6、7、12、27、43函的目录。与顺治年目录亦略有不同。“续藏”第78函以后之目录与乾隆年抄本目录则大体相同。而且这两种目录“续藏”都止于第90函，“又续藏”均止于第43函。

综上所述，这四种目录有许多明显的不同。说明在历次刊刻过程中都有变化。其中以顺治年重刻目录和民国九年刻本目录最接近故宫藏《嘉兴藏》的实际情况。但由于这部大藏经在一百多年的续刻长河中，有了不少变动，所以与上述两种目录相比，又不完全一致。仅以民国九年刻本目录为例，故宫收藏的《嘉兴藏》较之多出41种131卷，这些大都是崇禎和顺康时期续刻时增加的。而且“正藏”还较其多出第211函。较民国九年目录少18种，其中6种在顺治目录上注“腐烂候刻”、“印造在先后造此藏无入”，1种为“藏本缺”，1种为乾隆年奉旨撤出；所余10种多为续刻时更改了。如“续藏”第51函，民国目录为“净信堂初集”，而顺治目录无此，故宫藏《嘉兴藏》内亦无此种，但有“碧岩集”。“又续藏”第6函，民国目录为“续传灯存稿”，顺治目录无此，故宫藏《嘉兴藏》内实为“阅藏知津”。由于几种目录的明显不同，而每种目录与《嘉兴藏》的实际情况都有差异，所以诸家对《嘉兴藏》的函、种、卷数的统计结果不一，原因就在于依据不同，计算方法亦不同，如子卷，一律不计入卷数。同时也说明仅据某种目录统计是不能完全反映某部《嘉兴藏》的真实情况的。

## 六、《嘉兴藏》的史料价值

关于《嘉兴藏》的史料价值，李孝友同志在《浅谈明代刊刻的径山藏》一文中，（见《文献》丛刊第四辑）已做了详细介绍，这里无须重复。只想就“续藏”、“又续藏”部分做些必要补充。

《嘉兴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于它除收录了宋元以来入藏的大小乘经论外，还续收了一大批中国历代高僧撰述的疏论、文集、史传和杂著。特别是明以来各派禅僧盛行撰著的传灯录和世谱，清初盛行辑录各宗禅师的机缘、法语、文集杂著、塔铭行状等，刊板流行，并送交嘉兴楞严寺请求续入《嘉兴藏》内。所以，“续藏”、“又续藏”中以收录明清两代各宗禅僧的灯录、世谱、语录、杂著为最多，其中不少著作是在其他典籍内不见著录的，因而资料价值很高。如“禅林僧宝传”、“寂音尊者智证传”、“大明高僧传”、“教外别传”、“佛祖宗派世谱”等，是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和各派禅僧传记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语录部分，大多附有作者的行状、塔铭、年谱，这些也是现有的人名辞典、佛学辞典等工具书中未曾收入的，对了解明清以来禅僧传记颇为有用。像“百痴禅师语录”、“卧雪童真禅师语录”、“憨休和尚敲空遗响”等，载有不少书画碑帖的题诗、序跋，其中多有对书画艺术的评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明清禅僧的语录内，多附有一定数量的诗文、歌赋，如“紫柏老人集”、“憨山老人梦游集”、“香严禅师语录”、“即非禅师全录”等，载有许多水平很高的诗文，不仅气势磅礴，生活气息、乡土气息也很浓郁，表现了佛教文学的鲜明特点，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佛教文学的重要材料。而“密藏禅师遗稿”、“颢愚和尚语录”等，还是研究《嘉兴藏》刊刻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其次，这部大藏经几乎于每部经卷之末，都附有一定数量的音释。对佛经中的冷僻难懂的字词，给以注音和注疏，表明应读的音韵和词意，这些又是研究语言文字方面的宝贵材料。

总之,《嘉兴藏》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有对中国佛教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和中国佛教各主要宗派的代表著作,也有研究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佛教文学和历代禅僧传记的重要史料。李一氓同志说:“至于佛典、道藏,我们把它们当成中国哲学的古籍来整理,不能仅仅意味为宗教。同时,它们在历史上表现为行动时,又是和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思想史、军事史分不开的”。所以,研究我国宋明以来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及其他学科历史,不研究佛教和佛教哲学及其文学的发展,就不可能了解它们的全貌。《嘉兴藏》是现存历代大藏经中极为重要的佛典,特别是“续藏”、“又续藏”部分,吸引着国内外的学者,日本新刊《大正藏》之所以收录该藏的续藏部分,就在于它的学术资料价值很高。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嘉兴藏》,由于续刻时间晚至康熙四十六年,因而所收内容丰富,更具资料性。随着我国佛学研究的日益发展和其他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嘉兴藏》必将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983年10月

